关键要办好职业教育

经济学家

王东京

前些天我写《将“双减”进行到底》，此文在本专栏刊出后读者回应热烈。有读者反映：现在校外培训只是改了方式，学生的作业负担也并未减轻，甚至更重。细问原因：原来，中小学校一般是下午三点半放学，而为了阻拦学生参加校外培训，教育部门要求五点半才能离校。要在校多留两小时，老师当然得多留作业。

看得出，教育部门作此规定只是权宜之计，也是无奈之举。从效果看，确实存在顾此失彼的弊端，而且时间长了会适得其反。读者想想，即便将来社会上没有了培训机构，难道学生不会去“一对一”补课？而“一对一”补课与培训机构补课有何实质差别呢？难怪最近有中小学教师抱怨：“双减”已变成学生与教师“双累”。

学生作业负担重若真是因为上面的原因，解决起来倒也不难。可是据我所知，作业重的原因并不在于此，而是“中考”。照现行政策规定，“中考”将对初中生予以分流，50%可以读高中，另一半只能读职校。而“升学率”关乎学校声誉，校长不可能不重视。而要抓升学率，办法无他，学校只能让学生多做作业多刷题。

事实上，“中考分流”不仅加大了学校的压力，同时也给家长造成了恐慌。在许多家长看来，孩子考上高中才有出息，将来可以考大学、读研究生、读博士；而有了高学历，才有希望进入政府机关吃公家饭。人们有此观念，其实也是事出有因。比如时下政府招录公务员，通常都要求有本科以上文凭。由此可知，若一个孩子考不上高中，今后当公务员的机会就几近为零。

当然，并不是所有家长都希望孩子当公务员，也并非只有当公务员才有出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对有些家庭来说，孩子上职校若能学到真本事，早就业、早挣钱也未尝不可。可家长却有两方面的顾虑：一是用中考“分数”分流，担心孩子考不上高中会觉得低人一等、自暴自弃；二是目前职业教育的水平整体偏低，家长对孩子接受职业教育的前途怎样心里没底。

将心比心，家长有这样的顾虑也在情理之中。读者不妨扪心自问，假若你的孩子今年中考，你会让孩子上职校还是上高中？答案不必说出来。这些年，我见过不少官员大讲职业教育如何好、有多么重要，却不见他们把孩子送去上职校。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并不真的那样看。官员自己都不信，老百姓怎么会相信呢？

存在决定意识。人们不看好职业教育，并非对职业教育有偏见。事实明摆着，由于政府过去对职业教育投入严重不足，无论教学设施还是师资配备，与普通院校比皆有不小的差距。近年来虽有改善，但总体还是欠账太多。特别是民办职业学校，资金完全自筹，对学生收费也高，假若我是家长，也不会让孩子上职校。

是的，人们不愿孩子上职校，不能简单归结于家长的偏见。我有个问题想问读者：师范教育是不是职业教育？照理讲，师范院校专门培养教师，当教师是一种职业，师范教育也应该属于职业教育，可人们为何对师范院校没有偏见呢？我的解释，是因为教育部将师范院校划归普通教育系列，可以享受普通院校的相同待遇。

设想一下，假若当初国家规定，每年高考后，先让普通院校录取考分高的学生，考分低的学生只能上师范院校，人们对师范院校会怎样看？再比如，若师范院校的学历只有当教师才承认，而改行做别的职业社会上不承认，师范院校的学生是不是也会感到自己受歧视？

说我的观点，人们不看好职业教育，虽有观念方面的原因，但归根到底，还是目前职业教育的办学质量不尽如人意。要改变人们的观念，关键是要办好职业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制度创新、政策供给、投入力度，弘扬工匠精神，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社会地位。为此，我提三点建议。

第一，加快建设一批具有高水平的职业院校。职业教育要达到高水平，不仅要有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和教学设施，同时还得构建从中职、高职到本科等不同层次的职教体系。具备了以上条件，人们当然不会再歧视职业教育。前几天，我在一个座谈会上听说湖南的职业教育办得好，有不少大学本科生主动转入职业学校学习，这是好现象，表明人们的观念已经开始转变。

第二，改革“中考分流”。我并不反对“中考分流”，但不赞成目前的分流办法。现在让考分高的学生上高中、考分低的学生上职校，对职业教育带有明显的歧视，必须纠正。可取的做法，是让学生自主选择，中职与普通高中分开考试，分别择优录取。当年我读中学时有同学考技校，技校是择优录取，同学没有半点自卑感。

第三，实行职普通融。这一点尤为重要。假若职业教育学历与普通教育学历互不通融，比如报考研究生，普通高校不承认职业院校的本科文凭，或者参加工作后在职称评定、职务晋升时学历不能同等对待，人们怎么会看好职业教育呢？目前正在修订职业教育法，若能在法律上明确“职普学历通融”，此问题即可迎刃而解。

从操作层面上讲，办好职业教育，我认为当务之急是政府要加大投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若没有政府财政支持，短期内职业院校不可能达到高水平；若没有高水平的职业学校，家长不愿让孩子上职校，“中考分流”改革将无法进行。经济学逻辑说，若不改变现在的“中考分流”办法，“双减”最终不可能落实到位。

积极财政政策的三大重点

□ 冯俏彬

在世纪疫情冲击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2022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做好2022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财政支出保持一定的强度，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

2021年我国财政收入形势较好，1—10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1526亿元，同比增长14.5%。综合研判，2022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仍将继续保持较好增势。目前我国财政赤字率不高，2021年为3.2%，远低于世界上主要经济体。政府债务虽然绝对量达到46.55万亿元（2020年），但占GDP的比重（负债率）为45.8%，低于国际通行的60%警戒线，风险总体可控。这些都为2022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预计2022年将迎来一个相对的财政扩张期。

与2021年相比，2022年财政支出将保持一定的强度，并且“靠前发力”，支出进度将进一步加快，以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对稳增长的支撑作用。预计2022年我国政府支出规模、债务规模将有所增加，特别是地方政府专项债仍然将保持较大力度，总规模可能不低于2021年的水平。由此释放出来的巨量资金，将主要用于扩大政府支出、增加政府投资，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从投资方向上看，既包括加快城市管道老化更新改造这样的民生项目，也将重点围绕数字化转型和绿色转型这两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以各类“新基建”为主体，面向未来、面向全局，突出基础性、公共性，短期为稳增长作贡献、中长期为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需要指出的是，在积极财政政策释放出巨量资金后，对各级地方政府的项目准备、实施、管理能力也将提出更高的要求。进一步加强项目策划和储备，提高项目库的“容量”和“质量”，防止“钱等项目”或资金与项目“分家”。进一步强化项目与资金之间的匹配程度，保证项目建成后能有一定的收益和现金流。做好项目管理，努力提高项目的投资绩效。总而言之，坚持形成有效投资，确保形成实物工作量，切实将宝贵的财政资金用到“稳增长”的刀刃上。

继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提高政策的精准性

自2015年以来，我国每年都推出力度不同的减税降费政策。据有关部门统计，“十三五”期间，我国累计减税降费金额达到7.6万亿元，有力支持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为了继续做好“六保”“六稳”工作，2022年我国将继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出台新的减税降费措施。但与过去相比，2022年将更加突出减税降费政策的精准性和针对性，主要瞄准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制造业等国民经济运行和产业链供应链中的重点环节、薄弱环节实施有针对性的政策扶持。这主要是因为在当前疫情冲击还没有完全过去的背景下，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仍然是受经济下行影响最大的部分，而他们直接关系着就业和老百姓生计，是实施“六保”“六稳”政策的关键环节。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制造业虽然率先恢复，但2021年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国际运价等大幅度上涨的影响，特别是面对全球供应链重组的压力，需要相应的政策扶持以强基固本。从方式上看，2022年减税降费政策的结构性优化、适当扩面将重于普惠式、大规模的减税。“减税”主要是进一步优化落实已经出台的政策，如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加速折旧、增值税留抵、小微企业税收优惠等。“降费”则是进一步加大“清费”的力度，重点清理整顿各类不合理、不合法收费，规范政府性基金，规范行政权力、规范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切实减轻市场主体的负担，进一步提高我国营商环境的质量。

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始终保持好我国财政的可持续性

2022年是重要的结构调整期。从国际上看，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仍将处于加速演化期。全球供应链向区域供应链的调整重组已成定局。从国内情况看，我国经济数字化转型才处于起步阶段，绿色转型更是任重而道远，多年积累下来的结构性矛盾、问题风险也需要有序化解。与此同时，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不断丰富，对优质教育医疗、良好生态环境等需求愈发强烈，对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呼声很高……所有这些，都将转化为对政府财力的现实需要。中长期而言，财政可持续面临压力。

进一步统筹好发展和安全、长期与短期的关系，保持好我国财政的可持续性。在“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总要求下，2022年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支出的同时，更加注重精准、更加注重提升效能。一是处理好“扩支”与增效之间的关系。扩大支出不是所有的支出都同步增加，财政支出结构同样要有增有减、有保有压。突出财政支出的重点，主要支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急需，同时强化对长远发展有益的科技创新、能源转型、制造业发展、粮食安全等方面的支持。二是始终坚持近年来党政机关过紧日子的传统，原则上不增加一般性支出，继续严格控制“三公”经费，严格执行各项经费开支标准，严禁各类楼堂管所和形象工程建设支出，严禁铺张浪费和大手大脚花钱，厉行节约办一切事业。三是进一步严肃财经纪律，对财政收支中的各类违规违纪现象严格查处，坚决制止。四是实施好全面预算绩效管理，将绩效要求落实到每一分钱上，推动绩效管理向纵深发展。五是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坚决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对各类新增隐性债务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问责一起，终身问责、倒查责任；稳妥化解隐性债务存量，完善常态化监控、核查、督查机制，对各类隐性债务风险隐患做到早发现、早处置，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六是加快预算一体化建设工作，用好大数据在财政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全面提升财政管理现代化水平，发挥好财政对于国家治理的基础和支柱作用。

经济观察

正确认识和把握初级产品供给保障

□ 张俊伟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发展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其中，“初级产品供给保障”就是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之一。

确保初级产品稳定供应意义重大

初级产品指的是人们直接从自然界获得的、尚未加工过或仅经过简单加工的产品。在社会生产体系中，初级产品处于社会生产的前端，为整个经济的运行提供能源、原材料和生活必需品（食物）支撑，是社会生产的基础和前提。没有了初级产品，所谓中间产品、最终产品也就无从谈起，甚至连人类社会都难以生存！正是由于煤炭、石油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人们亲切地把它们分别称作“工业的粮食”和“工业的血液”。

初级产品的特性，决定了其生产和供给高度依赖于自然禀赋条件。粮食的生产离不开耕地和相应的光照、水热条件，而矿石、能源的开采更与矿脉品质和储藏条件密不可分。我国幅员辽阔、物产丰富，但被众多的人口平均之后，我国又是人均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大量进口初级产品，同时大量出口制成品的独特贸易格局。从出口角度看，在对外开放初期的1980年，我国产品出口中初级产品占50.3%，到1990年，初级产品占比就下降到25.6%，再到2020年，初级产品占比进一步下降到不足4.5%。从进口角度看，我国进口产品中初级产品所占比重1980年为34.8%，1990年曾下降到18.5%，但到2000年又上升到20.8%，到2020年又进一步上升到33.2%。从绝对值看，从1980年到2020年，我国初级产品出口从91.14亿美元增长到1156.29亿美元，增长了11.7倍；而初级产品进口则从69.59亿美元增长到6960.07亿美元，增长了97.7倍，超过58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这充分说明了我国初级产品的供给特征。

初级产品进口数量的增加，使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买方地位越来越重要。2020年中国进口铁矿石占世界各国铁矿石出口量的77.3%；2018/2019年度中国进口大豆占世界大豆出口量的57%。2020年，中国原油进口占世界各国原油出口的26.4%，从增量角度衡量，中国原油进口的增长是驱动世界原油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2020年世界各国原油进口减少了1.57亿吨，而中国原油进口却逆势增长5000万吨。随着中国成为国际市场重要买家，完善相关机制以确保中国的买方权益、确保初级产品的稳定供应就变得越来越有必要。

初级产品供应的风险逐渐显现

在供需双方长期而激烈的利益博弈中，初级产品的国际贸易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交易规则。如：上下游企业交叉持股使经营风险内在化，供求关系以长期合约为主，依托期货市场开展套期保值和风险管理；深入细致的信息搜集与发布，生产、运输、储存和加工环节有机衔接，等等。

作为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中国是初级产品国际市场上的后来者，尚未被既有的交易网络所充分接受；再加上对既有的交易规则不够熟悉，国内企业就出现了许多“不适应”。具体表现在：由于数量众多、合作意愿低，国内企业在国际谈判中议价权偏弱，难以获得与购买量相当的优惠待遇；许多企业为了获得低价优势，甚至大量采用短期现货合同的交易方式；人才不足和金融意识缺乏导致国内企业对套期保值交易利用不充分，在价格下跌时削减库存，在价格上涨时增加库存，加剧了现货市场交易的波动。这些都使中国经济面临着来自初级产品市场的巨大潜在风险。

由于铁矿石、有色金属矿、煤炭、石油等初级产品价格快速上涨，2021年国内钢铁、有色、化工等上游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导致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出现了节节攀升的局面。与此同时，受市场购买力的制约，也由于下游加工企业市场集中度较低，难以把成本上涨转嫁到最终产品价格中去，居民消费价格则相对平稳。于是，出现了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相背离的现象。到11月份，PPI和CPI两者之间的“剪刀差”甚至达到10.6个百分点。在巨大的落差背后，隐藏着的是利益分配的严重失衡：一方面，居于产业上游的大型（冶金类）企业利润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居于产业下游的诸多中小企业则面临原材料价格暴涨和市场销售疲软的双重挤压，企业经营压力空前加剧。不仅如此，由于煤炭价格快速上涨而火电上网电价没能及时跟进调整，发电企业出现大面积亏损。为了减少经济损失，发电企业纷纷安排“停机检修”，结果导致电力供应紧张，出现频繁的“拉闸限电”，甚至出现了“停四开三”“停五开二”的现象，严重地干扰了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初级产品供应的风险充分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加快构建新的市场运行架构和风险防控制度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5年就强调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要“确保粮食安全，保障能源和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如果安全这个基础不牢，发展的大厦就会地动山摇”。习近平总书记还明确提出：“要加强保障国家安全的制度性建设，借鉴其他国家经验，研究如何设置必要的‘玻璃门’，在不同阶段加不同的锁，有效处理各类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上述新论述新要求，为做好初级产品供给保障工作、有效化解经济运行风险指明了方向。

正像前面指出的那样，“大量进口初级产品、出口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格局是我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发展经济的结果。我们要广泛参与国际分工，就必然会大量进口初级产品。因此，保障初级产品稳定供给，不是要回到“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而是要在发展和安全、开放和风险控制之间建立新的平衡。

这种平衡是建立在对外开放基础之上，同时又充分兼顾社会利益的；是建立在市场机制基础之上，同时又接受政府干预的；是建立在追求“价廉物美”的经济性之上，同时又充分考虑风险承受能力的。具体到操作层面上，就要求我们深入分析不同品种“战略性”初级产品各自的独特风险来源、市场波动对国内生产和居民生活的影响（包括影响性质和影响程度）、企业和居民对初级产品市场波动的可选应对措施，以及政府干预市场运行的门槛和可选政策工具箱等，有针对性地构建出“战略性”初级产品新的市场运行架构和风险防控制度。具体如：对于粮食问题，我们必须牢记“民以食为天”，确保“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为了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要全面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深入推进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持续推进种业振兴，确保种业安全；完善好落实好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制度，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同时，还要采取措施鼓励粮食节约、反对“舌尖上的浪费”。对于矿产品、能源类产品，则要着力增加海外生产能力建设，推动供给多元化；提高国内企业集体行动能力，提高国际谈判中的“话语权”；鼓励相关企业利用期货交易等手段进行风险管理，减少现货市场波动；加强运输、中转、储存等保障能力建设，提高市场运行韧性；建立、完善市场运行监测机制和国家储备制度，明确政府干预市场的门槛。同时，还要鼓励部分生产企业积极向海外转移产能，把进口初级产品转化为进口制成品，以及提高产品技术标准，减少资源性产品使用，采取措施鼓励资源再循环再利用，等等。

热点透析